

# 元史新講自序及凡例

李則芬

## 自序

顧亭林「與公肅甥書」曰：「諸史之中，元史最劣，以其旬月而就，故舛誤特多。如列傳八卷速不台，九卷雪不台，一人作兩傳；八卷完者都，二十卷完者拔都，一人作兩傳。幾不知數馬足，何暇問其驪黃牝牡耶？」（明史列案卷八。又日知錄亦有此言，但語氣沒有這麼嚴厲。）顧亭林此說，判定了「元史」一無是處，為二十四史中最劣的一部。「明史」是針對「元史」缺點而編纂的，趙翼說，近代諸史中，除歐陽修「新五代史」外，未有如「明史」之完善者。（二十二史劄記史卷三十一）

「明史」與「新五代史」好在那裡？依據舊史觀的標準，一是文簡，一是沒有重複或互相抵觸之處。（其實也不盡然，例如據馮承鈞考定，「明史」卷三三二西域傳之哈烈、黑婁二傳是重傳；卷三二五之南渤利，與卷三二六之南巫里也是重傳。）翻過來說：「元史」的缺點，就是文繁而事不統一，諸傳紛歧。然舊日的史家，只有一個道德史觀，今日的史學則是多目標的，不能再像兒童看電視一樣，只分好人壞人，所以最希

望舊史盡量替後人多留一點原始史料，多多益善，最忌翰林編修們各憑己意大事刪削過的東西。

因此，繁而不統一，反比簡而強求一致者好。例如列傳互有衝突之處，可使我們從各種不同角度，來研究一個人或一件事，從而獲得更清楚或更正確的認識。本紀記事詳盡，則可用以鑑定列傳謬誤或不實之處。從這個新觀點來看，「元史」雖使一般讀者頭痛，却是治史者的豐富寶藏。換言之，前人所指摘的「元史」缺點，反而變為優點了。（本書二十九章一節曾舉例詳論，可參看。）

因此，時至今日，「元史」的缺點，不再是顧亭林、趙翼等前人所說的毛病。然亦另有所蔽。作者下了七年苦工，總算得到了有系統的認識，而最重要的是發現「三蔽」。這三蔽不破，無論下多大工夫，還是看不清元代真面目的。

第一個蔽是，蒙古統治中國，儘管用漢人，行漢法，蒙古本身自有其背景、立場，及內在要求，與漢人漢法不無抵觸。所以終元之世，行的是蒙漢二元政治。二元之間，時有衝突，而政治也隨之而起變化——有時激盪得很厲害，有時則僅僅吹縐一池春水。可是，無論明初的「元史」編者，或原始的「十三朝實錄」與「經世大典」

的編者，以及列傳所依據的所有碑銘作者，全是漢人儒士，或漢化甚深的蒙古色目人。他們的作品，只代表二元中的一元，即儒家觀點；另一元完全沒有代言人。換言之，元代的公私文獻，全是儒家的片面之詞，不是事實的全部真相。作者發表過一篇「漢蒙思想衝突對元代政治的影響」，載於東方雜誌復刊號七卷三期，現已收入本書二十九章，對此分析甚詳，可參看。

第二個蔽是，元代歷史被明人歪曲了。古今中外，無論任何國家民族，當其強盛時，則提倡世界主義（不論其為王道的或霸道的），衰弱而遭受外侮時，則提倡民族主義。明初，國勢強盛，提倡的是世界主義。明太祖口口聲聲「天下一家」，「蒙古色目皆吾赤子」，毫無排斥蒙古色目人的意思，也不諱言元代的光明面。所以明初對於元代的議論，相當公正，一般皆承認「元政寬大」，除指責順帝末年政亂外，對於順帝以前諸帝，上溯至世祖忽必烈為止，皆承認其愛民恤民，並承認元初可稱小康。明太祖就說過：「元祖宗功德在人」；「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」；「元初君臣樸厚，政事簡略，與民休息，時號小康。」明太祖對於元世祖忽必烈尤為尊重，他所

建歷代帝王廟，去隋文帝、唐高祖（唐以太宗爲開國主），而有元代開國主世祖忽必烈之祀。明初人民也很懷念元代政寬，士人多以元遺民自命，不願仕明。洪武初發行銅錢，民思元鈔便利，不樂用錢，明太祖遂仿元制而發行明鈔。明初的私人文集也罕有指斥元政的——除不滿順帝末年的荒淫失政外。方孝孺甚至說，元代吏治比明初好。明初的民間社會，也完全沒有排斥或岐視蒙古色目遺民之事——那些人流落在中國，仕明爲官、爲商、隱居、教學、流浪、賣卜、行醫，各聽其便。

中葉以後，明朝國勢漸衰，外夷之患日深，海上有倭寇，北方有韃靼。正統十四年（一四四九），英宗爲韃靼所擄，朝廷甚至有遷都南京以避韃靼之議，於是民族主義遂開始抬頭。及東林黨興起，提倡氣節，益嚴夷夏之分。隨着民族主義的興起，對四夷的論調由是一變。而反遼，反金，反蒙古的捏造歷史及小說，便紛紛出現。

歷史方面，最極端的，是王洙（正德進士）撰「宋史質」一百卷，直以明繼宋統，於宋益王之後，繼以明太祖朱元璋祖先名諱，根本除去元代諸帝的年號。柯維琪（嘉靖進士）撰「宋史新編」，亦置遼金於外國，又以廣、益二王嗣正統，增景炎、祥興二朝。

小說方面，嘉靖年間出現的武定侯郭勳家本「水滸」，把羅貫中舊本的討田虎、王慶等章刪去，而加上宋江征遼。又有北宋「楊家將傳」，以鼓吹抗遼；「大宋中興岳王傳」多種，以鼓吹抗金。可惜南宋末年根本沒有將才，否則也會有

人寫抗元小說的。

同時對於元代名人，也就大肆攻擊，極盡誣蔑之能事。例如明初仍極受人崇拜的趙孟頫（子昂）書法，被斥爲「奴書」。明初以爲「吳澄問學之功，朱熹以來，莫或過之。」因得從祀孔廟。到嘉靖九年便罷其從祀。對虞集則加以種種誣蔑，甚至謂其被順帝押解京師，以致雙目失明。隱逸清高的蒲壽庚，變成了其弟壽庚叛宋的主謀人物。周伯琦、李伯昇入明後皆有下落，一回鄉後始病故，一仕明，亦被誣稱二人皆爲明太祖所殺。

到嘉靖間，歷代帝王廟的元世祖忽必烈神主遂被除去。元人的文集不復有人過目，動輒謂「元代無文」。至於無法否定的元曲，則誣之曰「元代以曲取士」。到那時候，但見感情用事，逞快一時，不復考慮事實不事實。

薛應旂是嘉靖進士，陳邦瞻是萬曆進士，二人在這樣一個時代風氣中所編的「宋元資治通鑑」（後出的幾部通鑑，雖對薛書作過一些修正，因襲其舊說的仍多）及宋元二史「紀事本末」，內容不問不知。特別是宋元二史紀事本末的張溥史評，簡直把元代說得一文不值，把元世祖忽必烈罵得狗血淋頭。因爲張溥是崇禎朝進士，生當明代垂亡之際，感慨極深，又是東林黨後身復社領袖之一，意氣用事是東林黨人的一貫風氣。我相信他根本沒有讀過「元史」，只翻翻薛應旂通鑑及陳邦瞻二本紀事本末罷了。

於是，元代就一變而爲政治黑暗，毫無文化可言了。

第三個敵是前人考據的反作用。清代考據之風很盛，對「元史」指出許多錯誤。到了清末民初間，有關蒙古歷史的西方參考書，開始傳入中國，最初從事介紹的人，也很盡了一部分「證補」之功。然自其反面觀之，前後的考據和證補工作，也替「元史」添了許多新錯誤，新麻煩，有如治絲愈剪。因爲從事考據工作者，多存着一種成見，凡發現有與「元史」紀錄不相符者，不問其所據出處如何，異說可信與否，總以爲其誤必在「元史」，於是便各憑直覺，或作大膽論斷，或逕自篡改「元史」。至於最初介紹西方參考書進來的人，則因生當東西文化接觸之初，對於外國史地知識，所知有限，所以很多誤解。不幸，他們却往往以西方通自命，所作的證補，曲解武斷之處很多。其尤甚者，則以爲拚音萬能，往往不考慮其他因素，但憑對音隨意妄測，輕率地斷言中文某一名詞，即西文的某人某地或某一事物。猜對者有之，猜錯的亦殊不少。不但中國學人有此傾向，日本人及西洋人之研究「元史」者，也同樣的不免犯此錯誤。

有此三敵，元代歷史變成了迷魂陣，置身其中，使人茫然不知何去何從。於是，治史者視「元史」爲長途，而編通史、史綱等書的人，則但取捷徑，以通鑑、紀事本末爲主，一開始就被明人思想領導着，走入歧途，存着元代政治黑暗，毫無文化可言的成見。（以上本書三十二章七節有詳論，請參看。）

事實上，元代自世祖起以至末朝，除順帝的最後十幾年政治紊亂外，約有八九十年太平盛世

，安定繁榮，政簡刑清，交通便利，商旅安全，農村富庶，工商發達，國際貿易昌盛，號稱小康並不為過。元代的學風，是跟着宋代走的，一尊朱子，崇尚實學，也比空言氣節的明代高明。明代所編的四書五經大全——四書大全，周易大全，書傳大全，詩經大全，禮記大全，春秋大全——全是盜取元人的著作，朱彝尊「經義考」，及顧炎武「日知錄」，皆曾明白指出。

本書三十六章第二節，對於元代的著作，作過分類統計，可以參看。同章第四節，復有一段扼要的敘述，茲節錄如下：

……元代百年間，經學著作中，易類有二三部，一七四〇卷；四書類一四九部，六九二卷；春秋類一二七部，六五九卷。以時間為比例，大約與宋相等，而易類且過之。只因元代的經學家，除極少數人外，皆已變成了朱子的忠實信徒，跳不出他的圈子，故其內容，比較缺乏出類拔萃的著作。然事實總是事實，我們不能抹煞元代的學術風氣，跟着明人說元代沒有文化。又在三十二章第一節學校之部，作者也已指出，元代學校很普遍，書院數量多過宋代。

其次，元代私人文集也很多。錢大昕「補元史藝文志」分八類——別集、總集、騷賦、制誥、科舉、文史、評註、詞曲。別集類皆私人詩文集，統計一下，有作家六七七人，八九九集，六六七卷。百年之國有此數量，不能算少。以視南宋及明代，猶勝一籌。黃梨洲「明儒學案」序云：「唐之韓、柳，宋之歐、蘇

，金之元好問，元之虞集、姚燧，其文皆非有明一代的能及。」

本書的目標，是要突破這三蔽，以觀察元代真相，或比較近似的面目。對於史證的選擇，謹慎從事，必先鑑定事之可信與否，及時間空間是否適合，決不人云亦云，尤不以偏概全，輕下論斷。作者學淺才疏，負此艱鉅重任，不敢說已有多大成就；然自信所發見的三蔽，及所循取的科學研究途徑，當不會有何大誤。而且也已揭破了明人的謬說及一般人的成見，拿事實證明元代並不黑暗，更非毫無文化可言，而讓這一部元史，以新面目出現世人。

目前中國史學界，大家多怕麻煩，不願研究元代歷史。其實這一代史，才是英雄用武之地，可供開闢的園地很多。只要肯下工夫，無論研究任何一個專題，皆可大有收穫。有志之士，來接力罷。

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元月 於台北。

#### 凡例：

「本書是元朝史，以中國為主。詳言之，自世祖中統元年（一二六〇）至順帝至正二十八年（明洪武元年，一三六八），為本書的主要研究範圍。」

「世祖以前四朝——太祖成吉思汗，太宗窩闊台，定宗貴由，憲宗蒙哥——凡關於中國部分的事，特別是滅金經過，皆詳述。其他則從簡，因為這四朝的事，只是元代的前史。」

「作者已出版過『成吉思汗新傳』，為保持是書的獨立性，本書所有成吉思汗的事，除伐金及滅西夏戰役外，皆只簡述，且不再附圖。所有是書已經考定過的事，但云參看是書，不再複述作者的考證理由。因此，也可以說這一部書還得附上『成吉思汗新傳』才算完整。」

「西方三大藩——欽察汗國，伊兒汗國，察合台汗國——及窩闊台後人封地的事，由於資料缺乏，皆只作簡述，且以有關於整個大元帝國者為主。」

「時代進步，史觀變更。重寫元史，沒有保持舊史形式的必要。關於本紀部分，本書所注重的，是分析每一皇帝在位期間的主要政策及其人事部署，並將各該朝的大事，作有系統的敘述，進而研究其得失。舊史的志，已經完全改寫。不合時代的天文、祭祀、禮樂等，留給有興趣的專家去研究罷。地理、河渠、刑法諸志，則擷取其重要事項，分別夾叙於各有關部門，不立專章。選舉、百官、食貨、兵制等，皆用科學方法，重新組織，務須有條不紊，人人可懂。至於舊史所缺，而為現代史學必須探討的，如社會、學術、對外關係及各戰役經過等，則查考散見舊史及元人文集的零星資料，並參考其他書籍，分別另撰專章。舊史着重於人物的褒貶，所以列傳人物很多。本書選出少數關鍵人物，錄出其本傳，仍將其不實之處考出註明；其他則只作簡介。本書另有幾篇專論，如『元世祖忽必烈特寫』，『帝國的封建制度』，『漢蒙思想衝突對元代政治的影響』。

響」等，所討論的問題，都是研究元史的重要關鍵。

「元代列傳的排列有兩個原則，第一是先蒙古色目，次漢人南人；第二，凡一個家族有多人入傳的，特別重要者另立專傳，次要者附於最先一人之後。例如董俊子孫甚多，惟董文炳另立專傳，其他則附於董俊傳之後。（新元史及蒙兀兒史記的變更，反不如元史易查。）本書鑒於列傳查考不易，除仍依元史之例排列外，又於每朝的開頭，將該朝大臣而不在本章介紹的，列表說明查考何章何節。

「治元代史，最感苦惱的是人名。蒙古色目人同名者多，邵遠平「元史類編」凡例，曾舉出九個伯顏，十三個脫歡，十五個脫脫。偶一不慎，即有張冠李戴之虞，屠寄、柯劭忞二史就常常犯此毛病。作者雖小心翼翼，步步謹慎，恐怕仍不免偶有錯誤，希望讀者隨時指正。

「人地名的另一苦惱，是譯名多異，混淆不清，中西文史書及參考書皆然。本書的處理原則如下：

1. 蒙古人地名以「元史」為主，著名人物則附註其他譯名。例如太宗窩闊台，以秘史名斡歌歹為註。博爾朮用秘史名字斡兒出為註。異譯名很多的，則只擇要註記。

2. 外國人地名，凡當今史地圖書所常見的，皆改用現今通用譯名，仍將舊譯名註出。例如 Sultan 譯蘇丹，仍酌註算灘、算端、沙勒壇、蘇而灘等舊譯名。Mohammed 譯穆罕默德，

仍註明舊譯名摩訶末。Bagdad 譯巴格達，而舊譯名報達，八吉打、巴黑塔等亦酌註。Cair 譯高加索，而以舊譯名太和嶺作註；倘係引用洪鈞的「譯文證補」，則以其譯名高喀斯山作註。

「政治，經濟，社會的事，為好為壞，沒有絕對標準，只有比較之下，才容易明白。本書論事，常引其他朝代的作比較，以避免片面觀察與武斷結論之弊。雖與一般史書的寫法不同，我認為毋寧是必要的。

「元史本身多誤，再加上本書序文所指出的三蔽，幾乎每一件事，都得從頭考據過。本書所以夾叙夾論，與其他史書形式不同，不免有拖泥帶水之感，不得已也。

「中國古代文字，不講文法，又沒有標點，一句話，往往可作幾種不同解釋。作者所著史書，皆儘量引用原文，不改寫為語體文，以避免自己武斷曲解，而留給讀者考慮餘地。本書也是如此，故評論部分雖完全用語體文，而敘述部分則常夾雜着文言。自文章體例而言，自然是不好的，然亦不得已也。

「本書內容，約有二十餘萬言，是用專文發表過的，收在此處，因性質不同，自然有一番修改。大致可分為三類：(1)單獨發表的專題論文，除討論中心問題外，還得簡述有關的背景，而在此有系統的著作中，則無此必要，必須將那部分贅文刪去。(2)各別的散文收在一書之內，所引證的事例，往往有重複之處。重複部分文字較長的

，本書已刪去其一，改註參看某章某節。只簡述而不佔多少篇幅的，則仍保留原文，以免讀者翻閱其他章節之煩。(3)間有細微的增刪修改，亦在所不免。

「這一部元史，可說是革命性的嘗試，自然不可能做到十分圓滿的程度。實際上，我不過是披荆斬棘，打開一條研究元史的新途徑而已。所以不稱元代通史，而命名「元史新講」，正是要表明此書僅為作者一家之言，未敢視為定論的。

「本書初稿完成後，本想重新編排一下，統以若干篇，以清眉目，且使各章文字不復長短懸殊。然各章字裏行間，到處註有參看某章某節等語，一經改編，必須全部仔細檢查過。作者並無助手，工作能省即省，故作罷，可說是力與心遠。

「「元史」雖然缺點很多，其內容皆有所本。本紀所依據的是「十三朝實錄」，諸志是「經世大典」，列傳除依據史館保存的事蹟外，兼採碑銘文——總而言之，可說是準原始史料。本書只描繪出元史的輪廓，並非就是「元史」的代替品，要想進一步研究的人，仍須參考「元史」——惟參考「新元史」、「蒙兀兒史記」等，則特別須格外小心謹慎，「新元史」尤然。因為「元史」只有一蔽，而後者則三蔽兼而有之。

「這麼亂的一代史，無論多麼細心考據整理，錯誤總是免不了的，唯望讀者隨時指正。

（按：本書共五冊，三十六章，有圖四十九，表五十，都二百三十餘萬言，使用參考書四百餘部。）